



韩国现存元史相关文献资料的 整理与研究

舒健 张建松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韩国现存元史相关文献 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舒 健 张建松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现存元史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舒健,
张建松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671-1845-4

I. ①韩… II. ①舒… ②张… III. ①中国历史—文
献资料—研究—元代 IV. ①K24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0587 号

责任编辑 徐雁华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鑫

韩国现存元史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舒健 张建松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40 千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1845-4/K·136 定价: 46.00 元

本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项目号: 10YJC770074)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大学世界史一流学科的资助

谨此致谢!

他山之玉：高丽史料中的 蒙元史研究(代序)

一、高丽文集的基本状况介绍

13—14 世纪,是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发生巨变的时代。蒙古的迅速崛起对东亚国际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以礼仪朝贡为特征的关系模式。重新构建了古代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长期以来周旋于宋、辽与金政权之间、实行平衡外交的高丽王朝遭到了空前强大的蒙古势力的威胁,国家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韩国学者金翰奎认为,蒙元时期的元丽关系带有传统中韩关系中所看不到的特殊性质:“这一时期的韩中关系应该分两个时期来考察,其中一个时期是蒙古进攻韩国而韩国进行抵抗的时期,另一时期是蒙古占领中国后建立元朝,与高丽讲和,直到元朝灭亡的时期。在前期,只存在非制度的战争关系,而在后期,各种特殊制度规定了两者的政治外交关系”^①。该观点与日本学者内藤隼辅的看法大致相同,内藤在《高丽风俗对蒙古的影响》一文中将蒙(元)丽关系分三期:第一期从契丹遗族入高丽开始,属于斗争阶段;第二期服属时代,从高丽元宗末年,忠烈王娶元公主开始,凡八十余年;第三期为余波^②。

虽然如此,但高丽始终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元人姚燧描述这种状况说,高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境,惟所用之,不入天府”^③。即是说,高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各项制度都不改变,财政也相对独立。可以认为元与高丽的政治关系继承有过去封贡关系的成分,但双方的政治关系又与传统的朝贡关系有所区别,这种特殊性早

① (韩)金翰奎:《中韩关系史(上)》,朴昌根译,(韩)阿尔凯出版社,2005年,第327页。

② 见《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日)弘文堂书房,1930年,第651页。

③ [元]姚燧:《牧庵集》卷3,《高丽沈王诗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已为前辈学者体知,韩国学者全海宗教授就曾指出,

元代朝贡关系在形式上同其他时期朝贡关系有类似之处。只是就其实质而言,元朝的压制措施凌驾于朝贡关系之上,也就是说存在超过朝贡关系的另一层关系。换个角度表现这一问题,朝贡关系一般特征的实质是相互间礼仪占主要地位的关系。而元代的韩中关系强调的是单方面的支配权。两国间朝贡关系变为那种从属关系。^①

可以说,这个时期双方封贡关系的维系是以实力对比为基础的。一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双方政治关系的稳定就可能受到影响。

关于元丽关系的特殊性,还有一些类似的说法。萧启庆教授指出,“元丽关系不能以传统的封贡关系来描述。在元代,中国对韩国的关系,由消极的领导转变为直接的主宰。元朝直接主宰高丽所反映的是蒙古人的威服各国的世界观,而不是中国的修文德以服远人的观念”^②。两国关系由于蒙古的征服观念表现出某些不同以往的内容。黄枝连教授则提出:“蒙古人的好战和佞佛严重地扭曲了‘天朝礼治体系’。”^③这就是说,元与高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天朝礼治体系”的宏观架构之内展开的。

虽然此阶段元丽关系特殊,高丽始终面临着外来的巨大压力,但是此阶段的高丽方面却文化较为昌明,无论是官修史籍,还是文人私纂之集,皆相当丰富,传世之数量也甚是可观(其中文人私纂之集的一些内容被收入官修史籍之中)。总体看来,至今韩国保存了诸多有助于蒙元史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为同时代的高丽文人的文集;二为官撰史书,如《高丽史》;三为族谱、碑文、地图;四为传入韩国今在华已佚失的元代书籍,如《至正条格》。这些资料意义不仅在于“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④,更在于对此时期异族之人对吾国的观感、心态之考察。

① (韩)全海宗:《韩中朝贡关系概观》,载《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55—156页。

② 萧启庆:《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233页。

③ 黄枝连:《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0页。

④ 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就目前笔者目力所及,高丽中后期(主要指涉及蒙元时期到明初)传世之文集大致四十四部,各文集内容翔实,史料价值极高。现将此梳理如下:

表 0-1 高丽中后期文集概况^①

著 者	文 集	文 集 概 况	
		全 集	后 集
李奎报	《东国李相国文集》	诗文集共四十一卷;卷首有序,卷后并有年谱。	后集有十二卷,卷终附录一篇,并有跋尾。
陈 湲	《梅湖遗稿》	诗文集不分卷,卷首有序、小传、律诗绝句、卷后有跋。	
金 垵	《止浦集》	诗文集共三卷,卷首有序、附录(附录中有年谱、神道碑文)、卷后有跋。	
白贲华	《南阳诗集》	诗文集分上下两卷,卷首有序。	
李承休	《动安居士集》	诗文集共四卷,卷首有序、杂著一部。	
安 轴	《谨斋集》	诗文集共四卷,卷首有安氏世系图,卷后有跋。	
李齐贤	《益斋乱稿》	文集共十卷,卷首有序、跋、遗像,卷后有墓志铭、拾遗、跋。	
崔 濯	《拙稿千百》	诗文集共二卷,卷后有刊记。	
闵思平	《及庵诗集》	诗文集共五卷,卷首有序、跋、墓志铭、年谱。	
李 穀	《稼亭集》	诗文集共二十卷,卷首有年谱。卷后有杂录、跋。	
郑 浦	《雪谷集》	诗文集共上下二卷,卷首有序,卷后有跋。	
李达衷	《霁亭集》	诗文集共四卷,卷首有序。	
白文宝	《淡庵逸集》	诗文集共二卷,附录二卷,卷后有后叙、跋。	
李 集	《遁村杂咏》	诗文集不分卷,有序、律诗绝句、再刊跋、附录、重刊跋、补编、重刊跋。	
田禄生	《壑隐逸稿》	诗文集共六卷,卷首有序、纂辑诸书。	
李 穰	《牧隐稿》	牧隐稿分诗集与文集。诗集共三十五卷,卷首有牧隐先生文集序、年谱、行状、神道碑、碑阴记、画像赞、祭文。文集共二十卷,卷后有附录、跋。	

^① 本表据《韩国文集丛刊》,此处《韩国文集丛刊》是据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db.itkc.or.kr/>)与韩国历史文化研究在线(<http://www.krpia.co.kr/>)所制,表 0-1 和表 0-2 由文公新所制。

续 表

著 者	文 集	文 集 概 况	
郑 枢	《圆斋稿》	诗文集共上中下三卷,卷首有序,卷后有跋。	
韩 修	《柳巷诗集》	该集卷首有序、墓志铭、书、诗集、柳巷诗集识。	
郑道传	《三峰集》	诗文集共十四卷,卷首有序、后序、凡例。	
郑梦周	《圃隐集》	诗文集共三卷,卷首有遗像、序,卷后有年谱考异、附录、本传、行状。	
金九容	《惕若斋学吟集》	诗文集共上下两卷,卷首有序、先君惕若斋世系行事要略、先君惕若斋题惕若斋吟后,卷后有外集。	
成石璘	《独谷集》	诗文集分上下两卷,卷首有序、行状,卷后有跋、刊记。	
元天锡	《耘谷行录》	诗文集共五卷,卷首有序,卷后有事迹、跋。	
李存吾	《石滩集》	诗文集分上下两卷,卷首有御制赞、凡例、世系、年谱,卷后有附录补遗、后记、跋。	
李 詹	《双梅堂篋藏文集》	诗文集共二十五卷,存六卷,为一、二、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卷,卷首有年谱。	
赵 浚	《松堂集》	诗文集共四卷,卷首有序。	
河 仑	《浩亭集》	诗文集共五卷,卷首有序,卷后有跋。	
李崇仁	《陶隐集》	诗文集共五卷,卷首有跋、序。	
南 在	《龟亭遗稿》	诗文集共上下两卷,卷后有跋。	
卓光茂	《景濂亭集》	诗文集共两卷,卷首有序,卷后有光山卓氏世系、跋。	
河 演	《敬斋集》	诗文集共五卷,卷首有序,卷后有遗墨、跋。	
朴兴生	《菊堂遗稿》	诗文集共三卷,卷首有序,卷后有后识、后叙。	
李 行	《骑牛集》	诗文集共三卷,卷首有序,卷后有跋。	
尹 祥	《别洞集》	全 集	续 集
		全集共三卷,卷首有序、世系,卷后有后叙。	续集共两卷,卷后有跋。
郑 摠	《复斋集》	诗文集共上下两卷,卷后有跋。	
吉 再	《冶隐集》	诗文集分言行拾遗上中下三卷,续集上中下三卷,后有续集识。	
权 近	《阳村集》	诗文集共四十卷,卷首有序、年谱。	

续表

著者	文集	文集概况	
李原	《容轩集》	诗文集共四卷,卷首有年谱、序。卷后有后叙、跋。	
李种学	《麟斋遗稿》	遗稿共一卷,卷后有跋。	
申槩	《寅斋集》	诗文集共四卷,卷首有遗墨,卷后有寅斋集识。	
朴宜中	《贞斋逸稿》	逸稿共三卷,卷首有序、后叙,卷后有逸稿跋。	
卞季良	《春亭集》	诗文集	续集
		诗文集共十二卷,卷首有春亭集重刊序、旧序、旧跋、重刊识,卷后有行状、记记。	续集共四卷,卷二与卷三之间有遗墨,卷后有集识。
李稷	《亨斋诗集》	诗集共四卷,卷首有序。卷后有跋。	
林椿	《西河集》	诗文集共六卷,卷首有序,卷后有后序、重刻跋。	

由此表知,高丽中后期文集的数量甚为丰富,这些现存文集为研究高丽本朝及与高丽朝有民族交往的中原诸王朝的历史皆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其中述与蒙元史料相关的文集共二十九部,其中最早的为白賁华(1180—1224)的《南阳诗集》,最晚的为河仑(1347—1416)的《浩亭集》,这些诗文集的内容大致从诗、文两部分来分,诗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古诗等。文的内容较为复杂,大致分为序跋、表状、书疏、教册、史赞、碑铭等。

二十九部诗文集涉有蒙元史料的内容多为著者文人的亲身所历之事,如李承休的《东安居士集》,其中卷四《宾王录并序》,记述了李承休随使团出使元朝的活动,其中记述的往来日期及觐见大元皇帝的时间与《元史》中的记载不同,可考证《元史》中的记述问题^①。又一例,如李穀《稼亭集》中《韩公行状》关于武备寺结构问题的记述,武备寺下有三库:资武库、利器库和广胜库,而《元史》中载三库为寿武库、寿武库和利器库,经考证广胜库是后来改名为资武库的^②。由此可见,高丽中后期传世之文集,尤其涉有蒙元的史料是甚具史料价值的,遂把高丽

① 陈得芝:《读高丽李承休〈宾王录〉——域外元史史料札记之一》,《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

② 陈高华:《〈稼亭集〉、〈牧隐稿〉与元史研究》,《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中后期涉有蒙元史料的传世文集加以梳理。

表 0-2 高丽中后期涉有蒙元史料的文集

著 者	文 集	诗	文							备 注
			序 跋	表 状	行 记	书 疏	策 问	杂 著	碑 铭	表状：表笺与行状 行记：行录与记文
李奎报	《东国李相国文集》	13		38		34	1	4	4	另：教书/官诰 16 篇；谏词 3 篇
陈 湲	《梅湖遗稿》	3								
白贲华	《南阳诗集》	1								
金 垆	《止浦集》	6	2	57		4			1	另：教册 2 篇
李承休	《动安居士集》				9			2		另：宾王录 20 篇
安 轴	《谨斋集》	46		1			1		1	另：本传 1 篇
李齐贤	《益斋乱稿》	12	1	13		7	2		8	另：史赞 12 篇；世家 1 篇
崔 濯	《拙稿千百》		5	1	2	3			7	
闵思平	《及庵诗集》	4	3							
李 穀	《稼亭集》	186	12	9	23	2	5	1	8	另：杂录 8 篇；祭文 3 篇；铭赞 1 篇
郑 浦	《雪谷集》	37	1	2						另：艺文修制 10 篇
李达衷	《霁亭集》		2	7					2	另：说 1 篇
白文宝	《淡庵逸集》	5	2	1	2				1	
李 集	《遁村杂咏》	6								
田禄生	《壑隐逸稿》									附录遗事 8 篇
李 穡	《牧隐稿》	434	19	22	15				22	另：赞 2 篇；书后：7 篇；祭文 3 篇；传 4 篇；赋 1 篇；操 6 篇
郑 枢	《圆斋稿》	10		3						
韩 修	《柳巷诗集》	3								

续 表

著 者	文 集	诗	文							备 注
			序 跋	表 状	行 记	书 疏	策 问	杂 著	碑 铭	表状：表笈与行状 行记：行录与记文
郑道传	《三峰集》	54	8	7		1	2			另：经济文鉴 1 篇； 君道：宋 15 篇，元 14 篇，高丽国 33 篇；附 录事实 1 篇，诸贤叙 述 9 篇
郑梦周	《圃隐集》	139	3	1				2		另：附录 10 篇；年谱 改异 1 篇
金九容	《惕若斋学吟 集》	66	2							另：外集说 1 篇；赞 1 篇
成石璘	《独谷集》	21								
元天锡	《耘谷行录》	20								
李存吾	《石滩集》	2								
李 詹	《双梅堂篋藏 集》	2								另：年谱 1 篇；观光 录 191 篇；传类 1 篇； 文类 1 篇
赵 浚	《松堂集》	15		1		3				
河 崙	《浩亭集》	13	5		1	9		1	1	另：教书 3 篇；祭文 8 篇；附录 7 篇
李崇仁	《陶隐集》	66	10	20	3			4		另：辞 1 篇
南 在	《龟亭遗稿》	4			2					另：世系 1 篇；年谱 1 篇；遗事 1 篇；附录 10 篇

以上为涉有蒙元史料传世的二十九部文集，《韩国文集丛刊》中按著者的生卒年把文集划归为三个时期，即高丽时代初中期、高丽时代后期、高丽时代末期、朝鲜时代初期。其中《东国李相国文集》、《梅湖遗稿》、《南阳诗集》、《止浦集》、《动安居士集》属于高丽时代中期。《谨斋集》、《益斋乱稿》、《拙稿千百》、《及庵诗集》、《稼亭集》、《雪谷集》、《霁亭集》、《淡庵逸集》、《遁村杂咏》、

《壑隐逸稿》、《牧隐稿》、《圆斋稿》、《柳巷诗集》归高丽时代后期。《三峰集》、《圃隐集》、《惕若斋学吟集》、《独谷集》、《耘谷行录》、《石滩集》、《双梅堂篋藏集文集》、《松堂集》、《浩亭集》、《陶隐集》、《龟亭遗稿》属高丽时代末期朝鲜王朝初期。而在高丽时代中后期高丽开始与蒙古接触,此后丽蒙关系变化不断,基本被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抗蒙斗争时期”(1218—1259),二是“丽蒙联合征伐时期”(1260—1294),三是“和平时期”(1294—1368),四是“北元时期”(1368—1388)^①。

由上述对照可知,高丽时代中期的五部文集皆属于“抗蒙斗争时期”的记载,在这些文集中多数记述了高丽与蒙古初步接触时之史实,如李奎报之《东国李相国文集》中有《蒙古兵马元帅幕送酒果书》:

某月日,右谨致书于某官幕下,早春。伏惟钧候动止何若,瞻企瞻企。

我国久为契丹侵扰,病在腹心,不能自除,岂意元帅阁不将为小邦,扫清丑秽,举义远来,暴露草莽,其在小邦,职宜早致犒师之礼,少慰勤苦。然初不知大军入境之日,且系寇贼梗道,由是稽延,不以时修问于尤右,窃思无状,良用兢惭,惟大度宽之。

始闻贼徒入江东城自保,小国乃以为此已圈牢中物耳,不足患也,方遣人致谢,兼问起居。其使人未及上道,续有急报,果闻其党出城自降,咸就梟俘,举国快心,异手同抃,此实大邦扶弱恤邻之义。而小国万世一遇之幸也,感荷大恩。罔知所报。今者伏承王旨,略备不腆酒果仪物等事,特差某某官等,赍押奉送。其数目具在别笺,幸勿以微薄却之,亦不以迟缓罪之也,惶恐惶恐。^②

上述材料所示事件为高丽高宗五年(即公元1218年;南宋宁宗嘉定十一年、金宣宗兴定二年、元太祖十三年)十二月乙亥一日,蒙古元帅哈真及扎剌率兵一万,东真万奴所遣完颜子渊二万,誓言讨丹贼,攻和、猛、顺、德四城,破之,直指江

① (韩)金渭显:《高丽史中韩关系史料汇编》,台北食货出版社,1983年。

② 杜宏刚,邱瑞中,(韩)崔昌源辑:《韩国文集集中的蒙元史料》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

东城。高宗六年,赵冲、金就砺与哈真、子渊等合兵围江东城,贼开门出降^①。由此可知,此次接触可被视为丽蒙关系的开端,而丽蒙关系的发端是契丹遗兵对高丽的侵扰。

高丽在面对契丹遗兵的侵扰时多是束手无策,“不能自除”,于是高丽祈求蒙古为其“扫清丑秽,举义远来”,至此丽蒙交往得以发端。李奎报作为此时高丽朝的“右司谏知制诰”,上书时是以国之言辞邀蒙古为其国平契丹贼,然文士出身的李奎报也看出这是“引狼入室”,甚为国忧。

其在后来的《答东真别纸》中,李奎报写得更为清晰:

夫所谓蒙古者,猜忍莫甚,虽和之不足以信之。则我朝之与好,非必出于本意。然如前书所通,越己卯岁于江东城,势有不得已。因有和好之约,是以年前其军马之来也。彼虽背盟弃信,肆虐如此,我朝以为宁使曲在彼耳,庶不欲效尤,故遂接遇如初,以礼遣之。^②

李奎报认为邀蒙古为高丽平贼“势有不得已”,虽然与蒙古交和,但其不足信之,尤其是蒙古军马至后,蒙古背盟弃信,肆虐不禁,但又无可奈何,依然只能“接遇如初,以礼遣之”。这种复杂的心态不仅李奎报一人有之,与蒙古初步接触的文人心态多如是,如李承休、金坵等。然而这一复杂的心态,随着丽蒙关系的变化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高丽与蒙古因地缘、历史因素被分开,然而又因为地缘、历史因素开始相互接触,随后的一两百年里,两者建立起了持续的关系。然蒙古与高丽的关系,包含着胁迫、不平等和难以调和的民族间矛盾,而又因其信仰的文化传统差异极大,多发生冲突。在交往中蒙古更是强调蒙丽两者间的主从关系,又随着蒙丽间交往的不断加深,这种主从关系得以稳固,于是两者又在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上建立了共存关系。显然在这个过程中蒙丽间相互影响。

蒙元与高丽间不平等的共存关系更是对高丽人尤其是高丽中后期的士人产生了很大影响,蒙古人对高丽人心理的浸濡成为高丽士人群体心中无法挥去的

① (韩)金渭显:《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台北食货出版社,1983年,第395页。

② 杜宏刚,邱瑞中,(韩)崔昌源辑:《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阴影^①。蒙丽两者的接触交往,更是由于民族心理的差异及不理解的不断碰撞,而高丽人自身思想心理的变化变得更为值得关注。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中国学界对朝鲜半岛的研究素来较为关注,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抗美援朝”的热潮中,国内就已出版了张政烺的《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和周一良的《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开明书店,1951)两本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著。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研究着力点主要集中在双方的“友好往来”之中。其后如朴真奭的《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陈尚胜的《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亦继承了此研究思路。杨通方的《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1987)和赫治清的《历史悠久的中韩交往》等文是在中朝(韩)古代关系史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视角也是如此。

近些年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论著不断涌现,主要有杨昭全、韩俊光的《中朝关系简史》(辽宁出版社,1992);杨昭全、孙玉梅的《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刘永智的《中朝关系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黄枝连的《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吉林社会科学院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编写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杨通方的《中朝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蒋非非、王小甫的《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杨昭全、何彤梅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邵毅平的《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挑战与应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杨军、王秋彬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等专著。这些研究成果已经突破了之前侧重“友好往来”一面的研究,从边界、关系形态甚至战争角度入手来论述中朝古代关系史,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上述

^① “土人群体意识的凝聚,即是各族具有共同的艺术、信仰、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显然各族土人之群体意识已凌驾于族群意识之上。”见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507页。

黄枝连的论著，虽然观点甚为新颖，但史料分析不足，降低了其价值。另外各通史研究涉及的内容往往大同小异，在资料收集和整理上所取得的进展不大。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界“域外汉籍”概念的兴起，诸多有助于蒙元史研究的文献资料被“重新再发现”。目前国内元史学界利用韩国史料研究取得较突出成就者当属陈高华先生，他发表的相关论文包括《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耶律楚材与早期蒙丽关系——读李奎报的两封信》、《〈稼亭集〉、〈牧隐集〉与元史研究》等，充分利用了韩国史料解读出元代社会存在的一些经济、文化现象以及部分在中国史料中所载元代模糊的政治事件；另陈得芝先生的《读高丽李承休〈宾王录〉——域外元史史料札记之一》一文通过对《宾王录》的研究，补正了《元史》中有关“朝仪”的记载。可见上述两位元史研究先进都意识到现存韩国文献资料对元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此外国内还有桂栖鹏、喜蕾等学者也都发表了与此有关的研究论文。论著方面主要是乌云高娃的《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一书。

除研究性论著、论文之外，我国学者编辑并整理出版了与元代相关的一些韩国史料，如杨渭生编著的《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与此同时，韩国学术界也整理相关史料，如金渭显的《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金龙善的《高丽墓志铭集成》、张东翼的《元代丽史资料集录》等，为此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日本学界素来重视韩国史料，从早期的池内宏、箭内互到内藤雋辅都比较关注，但是早期的日本学界主要还是在官撰史书类用力颇深，其余资料如韩人文集则涉及不多。当前结合韩国史料与元史研究比较突出的日本学者为森平雅彦，他曾在《东洋史研究》、《东洋学报》发表过研究论文；欧美一些学者如 Gary Ledyard 等人对上述史料也颇感兴趣。此外目前北京大学张帆、党宝海等学者正利用在韩国发现的《至正条格》进行元代法制史、社会史的专项研究。另外内蒙古师范大学邱瑞中等学者也组织研究生对涉及元代的部分韩国文集进行研究和梳理的工作。

尽管各国学者在该课题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并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但与学界利用朝鲜半岛史料进行明清研究的情况相比，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学界未能综合解读与元代相关的韩国史料，尚未有学者系统地吧韩国史料作为一专门课题引入元史研究，所做的研究比较分散；其次，对涉

及元史研究的韩国文献资料尚缺乏系统的通读与版本的校勘等基础工作,导致目前出版的一些相关汇编资料的错误纰漏颇多,对史实的认知可能产生误导。再次,对韩国文集中蕴含大量涉及元代信息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除了陈高华和陈得芝先生利用了文集的部分资料,其他学者鲜有涉及,而这些文集作者的经历和记载正是研究元史的第一手资料,绝不能忽视,特别是韩人诗文中蕴藏了丰富的史料。因此如何从元史研究体系这一大背景出发,将域外史料与本领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本研究做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并由此重新审视元丽关系的建构对域外文人笔下的元代社会生活与元代历史做解读、还原,以及看待和理解同一历史事件双方史料记载的差异性,这是本研究所期待的。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涉及了三个方面:第一,主要是采用对比勘证中韩史料的方法对元史史料进行勘证与补充,解决目前元史史料中的一些问题,这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第二,主要突出一个“新”,因为对元代相关的大量韩国史料的使用,对于元史研究而言必然会出现一些新内容、新观点和新佐证,这些都将推动元史研究。此方面的内容根据不同领域史料的解读,会有不同的成果,如从朝贡贸易、文化交流、族群往来等多方面解读,都会有新发现。例如关于蒙元和高丽之间的朝贡贸易,目前学界通常的看法是对于高丽而言“是一种不平等的贸易,是强制性的贸易,具有残酷的掠夺性”,但如果从双方的关系发展来看,从当时高丽文人的文集(如安轴《谨斋集》)和《高丽史》中的一些记载资料来看,此种说法有失公允。第三,有部分内容微观个案研究,从韩国史料内容来看元代的社会生活诸方面。例如很多韩国文集记载了众多元代中原地区的佛教寺院和高僧,这些值得补充和发掘元代的宗教生活研究;同时一些高丽文人游览华夏大地,与中原文人唱酬,留下了诸多诗词歌赋材料,这对于元代的地名、山川河流、人物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三、另一种对史料的解读方式

上述是从传统史学的角度来看待史料的方式,由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传统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不断的挑战,因为不同史料的记载出入问题以及一些史家对史料采用不同的标准取舍,使得后现代主义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与客

观性,“最佳的应对,自然是接受挑战,促使深思与反省,以便对史学的本质,再作审视与检讨”^①。所以本研究在这方面受到了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的理论的影响:尝试将文献和口述历史视为“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历史心性”指称人们在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

王明珂先生认为前者是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相区别;后者指此“历史记忆”所循的选材与述事模式。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及两者的变迁,都是我们所欲探索的“历史事实”^②。一旦文献史料被当作一种“文本”(text)或“述事”(narratives),学者将不再以“史实”为取舍标准对一篇史料去芜存菁了。对于“芜”,学者或更兴趣——若一段史料叙述不是事实,或两者叙述中有矛盾,为何它们会如此?这一类的研究,多少都涉及一些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与身份认同(identity)理论。一篇历史文献,与一篇当代人的口述历史,都述说许多的“过去”,将之视为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主要是留下这记忆的“当代情境”——特别是当代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和相关的族群或阶级的认同与区别。由多元资料间产生的“异例”,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时代社会“情境”的复杂结构,以及一个“当代情境”与另一个“当代情境”间的延续与变迁。这样的研究取向能够打破“历史学者研究过去”而“人类学者研究当代”的观念。

如果以上述的观点来看待元朝和高丽文献对同一事件文献记载的差异问题,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入理解当时的“社会情境”。同样是上述提及的例子,对高丽而言,前去元朝贺岁的使臣责任重大,所以他们在使臣选择上,态度是严肃慎重的;而元朝由于当时国力强盛,万邦来朝,对于记载前来贺岁的异国使臣而言,更看重的是这一个国家是否来按期抵达目的地以及他们所献的岁币,至于使臣究竟是谁,则不是元朝关注的重点,所以在《元史》中关于高丽来华使臣姓名有误的问题比比皆是。

① 汪荣祖:《史学九章》导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页。

② 王明珂:《历史事实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